

# 言语间接现象之再思考

## ——《语用学学刊》2010年2月“言语间接性”专刊 评介

南通大学 王雪玉

---

---

**摘要:**2010年2月,《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第42卷以专刊的形式,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再探言语间接现象。专刊作者基于文化语境、会话结构等不同视角对交际中的间接性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分析,在一定的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并为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指明了方向。文章将逐一介绍专刊中的论文,并对其进行简单评介。

**关键词:**间接言语行为;语言人类学;文化语境

**作者简介:**讲师,研究兴趣为语用学。电子邮箱:wangxueyu@ntu.edu.cn。

---

---

### 1 引言

1975年,美国哲学家瑟尔(Searle)在奥斯丁(Austin)言语行为三分说的基础上,对言语行为做出了更全面的考察,创立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指出,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通过间接表达的方式实现话语意图,也可以说句子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间接关系,这就是间接言语行为。用于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语句具有两种意义:字面之意(literal force)和言外之意(illocutionary force)。换言之,间接言语行为是一种以言行事(言外之意)通过另一种以言行事(字面之意)的表达方式间接地实现的(1979: 30—31)。根据瑟尔的解释,间接言语行为可分为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两种,其主要差别在于表现方式上,前者含有言外之意显示手段(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听者可以根据语句的字面意义,按照使用的规约习惯推导出言外之意或话语意图;后者没有明显的句法标记,听者必须联系语境进行推导。瑟尔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

语意图(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揭示了语句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非直接的多元关系,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但同时,也有学者(何自然、陈新仁,2004,69—70)指出,间接行为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无法说明具体什么样的语境在话语理解中起作用、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使用间接言语行为等。

自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以来,言语间接现象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关注,国内外专家学者也纷纷撰文对之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从以往的研究不难看出,传统言语语用学者对言语间接性的研究往往都遵循塞尔式典型路线,侧重对“言外之意”或“话语意图”的考虑。如莱文森(Levinson)(1983:264)认为,言语的间接性产生于说话者使用的“言外之意显示手段”与“言外之意”或者“语言规约”与“话语意图”的不匹配。同样,以往的研究对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语境因素也缺乏详尽的分析。

2010年2月,《语用学学刊》第42卷以专刊的形式再探言语间接现象。同以往语言学家的研究不同,专刊另辟蹊径,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对言语间接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再思考”。

## 2 专刊介绍

专刊包括五篇文章。特约编辑斯科特·基斯林(Scott Kiesling)首先对其进行总体阐述,指出,专刊中的论文虽然在研究重点、方法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言语间接性的。传统言语语用学家对间接言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字面意义”和“话语意图”两方面,这正构成了本专刊作者们开展再思考的两个基本方向。首先,在“字面意义”方面,他们指出,间接言语行为中,交际者更多依赖词汇的指示、隐喻意义而非字面意义来进行话语含意的推导,因而,字面意义并非研究间接言语行为的基础。其次,在“话语意图”方面,他们认同语言人类学家的观点,认为,交际中“话语意图”是否存在根本无从知晓,而且,即使存在“话语意图”,在不同的文化下,该意图如何被理解也各不相同。在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下的间接言语行为可能在另一文化意识形态下被理解为直接言语行为。这样看来,我们需要在特定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关照之下考虑人们对言语间接性的看法。斯科特·基斯林对专刊两个基本研究方向的阐述具有提纲挈领作用。以下逐一介绍专刊中的五篇文章。

首先,马西丽娜·摩根(Marcyliena Morgan)的《日常生活中的言语间接性和权力》一文对美国非裔社团的言语间接现象进行考察。文章指出,言语间接性是交际者在判断、识别交际中多层会话含意时建构和表达身份的一种会话策略。从这个层面看,摩根(Morgan)对间接言语行为的思考已经超出“言外意义”,而更多

地将其看作社会参与框架 (participation framework) 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摩根在分析中融入了戈夫曼 (Goffman) 的社会面子理论 (1959, 1967) 和参与框架理论 (1974)。戈夫曼的社会面子理论指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一种公众形象 (1959: 2—3)。根据这一概念,摩根结合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演讲中的间接性策略,指出,间接表达有时能构建或展现说话者“极具魅力”的社会面子 (cool social face)。戈夫曼的参与框架理论提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自己某种话语地位并承担相应的参与角色,这些不同的角色及其合适行为的规范特征被代码化,从而形成一种参与框架。摩根从这个理论出发分析指出,政治演讲、新闻评论等通过媒体展现的交际活动实则是包含演员、目击者等参与角色的舞台表演。说话者是演员,听众是目击者。演员的任何话语都被目击者以相应的代码加以解读、评介。因此,言语交际无所谓直接还是间接,言语间接与否取决于听话者的解读。文章中,作者比较了不同种族、社区的交际者对同一话语的不同理解,强调文化敏感性对意义建构的重要性,以各种交际实例展示文化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体系对听话者话语解读的影响。

在《交际间接性的四种形式》一文中,斯科特·基斯林和埃尔卡·高什·约翰逊 (Elka Ghosh Johnson) 首先回顾了传统哲学家、语言学家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界定,即“说话者使用某一言外之力显示手段表达另一种言外之力 (Levinson, 1983: 264)”的行为。两位作者指出,正统言语行为理论侧重对隐藏在字面意义之下的话语意图进行研究。对此,他们借用两方面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是人类学家的观点。这些学者以西萨摩亚文化和菲律宾的伊隆戈文化为例,指出,在这些文化下,人们并不注重对话语意图的解读,因此,正如福利 (Foley) (1997) 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思想,注重交际中的话语意图并不具有文化普遍性,可能只是西方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的独特体现;二是来自谢洛夫 (Schegloff) (1988) 为代表的会话分析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考虑间接言语的会话意图时,应该把会话序列 (sequentiality)<sup>①</sup>纳入考虑范围,因为会话意图可能会随着会话的展开而逐渐被交际者识别。这些挑战与反驳,在两位作者看来,并不意味着传统的间接言语行为论需要完全被摒弃,而应将其当作言语间接性的一部分来考虑。最为重要的是,言语的间接与否应根据特定社区的语言使用习惯来判断。最后,他们主张应该将言语间接性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囊括社区中任何“非规约性”语言使用,并将不同形式的间接言语行为归为四类:态势间接 (stance indirection),即以表达某种人际关系的语言形式传达另一种甚至是与之完全相反的人际关系的言语间接现象,如使用体现权势、距离的敬语来传达亲近的人际关系就属于这种言语间接;话题间接

(topic indirection),即以当前话题当作传达“暗处”话题的间接手段;参与间接(participation indirection),即话语指向非规约性交际对象的言语间接现象,如汉语中常说的“指桑骂槐”就属于这一类;身份间接(production indirection)<sup>②</sup>,即交际者临时改变自己本来身份以实现交际意图的间接行为。最后,他们通过兄弟会成员间的对话,分析上述四种言语间接现象的具体表现。

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在论文《家庭交际中的类推和身份:“模仿说话”作为一种言语间接手段》中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言语间接现象——“模仿说话”(ventriloquizing),即说话者为了交际需要,模仿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份表达自己交际意图的言语行为。作者指出,家庭交际场合中存在多种“模仿说话”行为,如模仿不在交际现场的家庭成员的身份说话、模仿家庭宠物狗的身份说话、模仿未出世婴儿的身份说话,甚至还包括小孩子的自我身份模仿等。说话者临时借助被模仿者的身份特征,间接地传达自己的会话意图。坦嫩对这种间接现象的研究建立在贝特森(Bateson)(1979)的类推(abduction,即通过类比得出意义的一种心理过程)、弗雷德里克(Friedrich)(1986)的多变性(polytropy)、贝克尔(Becker)(1995)的前文本(prior text)以及巴赫京(Bakhtin)(1986)的对话性(dialogicality)等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些都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强调意义之间的相互关联。作者指出,通过类推、前文本、比喻以及对话进行意义操作也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而这种意义操作在日常会话中几乎无处不在。据此,坦嫩得出结论:言语间接性是语言中意义操作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层面。

与本专刊中其他作者不同的是,苏珊·菲利普斯(Susan U. Philips)将研究视点投向英语以外的“异域文化”。在《东加词汇敬语化过程中的语义和交际间接现象》中,作者关注于东加文化和言语实践,尤其是词汇敬语现象。文章比较了东加文化内词汇敬语化过程中的语义和交际间接现象。在语义方面,东加敬语产生于日常生活用语中词汇的隐喻外延(metaphorical extension)和语义弱化(semantic bleaching)<sup>③</sup>。其中,通过词汇的隐喻外延而产生的东加敬语反映出贵族与平民的行为举止等方面的差异,这一类敬语在东加字典占有很大比重;而在日常具体的言语交际中,交际者所使用的敬语大多体现出语义弱化的特征。从交际层面看,当东加敬语被置入语境(entexualization)后,也即被运用到实际交际中时,便形成一种特定的语域,也即“情景独特的语言变体”(Halliday, 1964: 75—100)。在具体交际中,说话者根据文化规约、交际场合以及交际双方的身份选择使用不同的敬语,而听话者同样根据这些因素对某些词汇的多种意义进行语义判断,选择最为合适的理解。从这个层面看,东加文化中的敬语使用实则是一种展现交际者身份和社会形象的言语间接现象。

较之前面四篇文章,迈克尔·西尔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的《从符号学角度看“直接”和“间接”交际行为》更像是一种理论综述。西尔弗斯坦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探讨语言中意义(包括直接意义和间接意义)的操作问题。文章中,作者首先批判性地回顾了工具主义者(instrumentalist)关于语言功能(包括指称功能和人际功能)的观点,认为从功能主义角度看,语言的直接或间接程度依赖于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的匹配程度。文章紧接着通过分析澳大利亚沃罗拉(Worora)地区用以标示“礼貌”和“疏远/禁忌”的社交指示,指出,间接性言语事实上可以看作是含有一定的指示标记语境下的语用标记性话语,其使用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定的文化规约下言语字面代码的变式用法。换言之,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直接言语行为与指示标记相结合,就可能产生字面代码以外的话语含意,从而使该直接言语行为转换为间接言语行为。从这个层面看,语言的间接性问题归根结底即是语言的指示性问题。最后,西尔弗斯坦对本期专刊中其他几篇文章进行评述,认为其他几位作者提出的各种语言间接现象也都可以从符号学角度加以分析。他指出,宇宙间指称概念和语境因素繁多,间接言语行为必然种类繁多且难以预测,因此更理性的做法是把语言的间接性看作语言意义操作的基本层面,而把语言的指示性作为研究语言间接性的主要手段。

### 3 简评

瑟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构成了传统语用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一理论也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尤其体现在瑟尔对间接言语行为中发生作用的语境以及对间接言语行为出现的原因等方面解释不够,另外瑟尔早期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讨论疏忽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言语行为隶属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其构成、运行及效果均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传统言语行为理论只关注单一的言语行为,忽视构成会话活动的往往是多个言语行为(何自然、陈新仁,2004:71)。

从本专刊的论文确实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对语言间接现象进行了一番“再思考”,力图弥补传统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首先,他们对间接言语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言外之意”或“话语意图”,而是逐渐把语言的间接性看作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而非单纯的语言现象,更多涉及到种族、权势、面子、身份等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因素。他们的研究具体阐述了瑟尔所未能阐述清楚的间接言语行为中发生作用的语境因素,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即间接言语行为的使用可能是社交面子和身份建构的策略,也可能是权势不对等的产物。同时,间接言语行为的研究已经更多地从以往的言者层面转至听者层面。语言使用的间接与否取决于话



语意图和听者理解的共同作用。最后,在五篇论文中,研究者都没有将间接言语行为看作一个单一言语行为,而是将其放在整个会话中加以考虑,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研究对间接言语行为描写上的不足。

此外,在间接言语的具体意义操作层面,所有文章都传达出这样一个新思想:意义操作应该沿着指示性方向进行。对言语的理解是采纳其“字面意义”还是“言外之意”往往跟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指示使用有着密切联系。具体说来,直接言语行为是语言形式的规约性指示使用,而间接言语行为则是语言形式的创造性指示使用。因此,应该将语言的间接性研究具体化到语言的指示性研究中去。

总之,本专刊为间接言语行为的深化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在对间接言语行为进行语言微观层面探讨的同时,应该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宏观层面。专刊中提及文化因素对间接言语行为的影响,但由于篇幅所限,仅仅涉及英语文化和东加文化。在高语境依赖性的汉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中,语言间接现象也许更具普遍性。作为中国研究者,我们应该关注如何将汉语中的间接现象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 注释

- ① 事实上,瑟尔在后来有关会话结构和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讨论中也承认了传统言语行为理论的这一缺陷,即“在很大的程度上囿于单一的言语行为”(Searle, 1992:7)。
- ② 根据文章中的阐述,production indirection指交际过程中说话者临时切换身份传达间接意图的行为。据此,笔者将其译为“身份间接”。
- ③ 埃林顿(Errington)(1988:90—91)指出,语义弱化是指单词本身语义模糊或具有多个意义的现象。

## 参考文献

- Bateson, G. 1979.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New York: Ballantine.
- Bakhtin, M. M. 1986. 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 In Emerson, G. & Holquist (eds.),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60—102.
- Becker, A. L. *Beyond Translation: Essays Toward a Modern Philosoph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Errington, J. 1988. *Structure and Style in Japanese: A Semiotic View of Linguistic Etiquette*.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Foley, W. A. 1997.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Malden: Blackwell.
- Friedrich, P. 1986. *The Language Parallax: Linguistic Relativism and Poetic Indeterminna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in Face to Face Behavior*. New York: Doubleday.
- 1975.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Halliday, M. A. K. 1964. The users and uses of language [A]. In M. A. K. Halliday, A. McIntosh, & P. Stevens (eds.),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Longman, 75—100.
- Kiesling, S. P. 2010.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indirection and the indexical cycle.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279—282.
- Kiesling, S. P. & E. G. Johnson. 2010. Four forms of interactional indirec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292—306.
- Levinson, S.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M. 2010. The presentation of indirectness and power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283—291.
- Philips, S. U. 2010. Semantic and interactional indirectness in Tongan lexical honorific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317—336.
- Searle, J.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Conversation. In H. Parret & J. Verschueren (eds.), *Searle on Convers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chegloff, E. A. 1988. Presequences and indirection: applying speech act theory to ordinary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 55—62.
- Silverstein, M. 2010. “Direct” and “indirect” communicative acts in semio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337—353.
- Tannen, D. 2010. Abduction and identity in family interaction: ventriloquizing as indirectne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307—316.
- 何自然, 陈新仁. 2004, 《当代语用学》,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